

□ 书香云南

伟大的家国情怀

——读王德三烈士《狱中遗书》

冯丽

90年前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德三同志的遗书,饱含深情,满是对家人的关爱与鼓励,然而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移孝为忠,献身真理,杀身成仁,其伟大的家国情怀,感人肺腑,光耀后世!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1898年生于祥云,是陕北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921年,王德三考入北京大学,在兄长王复生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并担任法文组翻译工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的派遣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工作。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陕西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参与陕北地委区党组织的创建活动。随后,他到陕西省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并负责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党工作。他充分运用国教师的作用,从改革教育制度入手,增设政治与科学课程,在师生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进步思想,引导学生大量阅读先进书籍,吸收积极分子入党。为了进一步发展陕大陕北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王德三奔赴陕西榆林、延安等地区开展工作,培养革命力量,发展团员党员。许多人都经由王德三介绍入团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陕北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陕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骨干力量和领导核心。王德三从创建和发展陕北党、团组织,到唤醒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陕北党的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7年,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王德三受党指派回云南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省委、临委、省委书记,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多民族边疆地区,王德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并结合云南实情,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他与同志们扛起了云南革命的大旗,发动了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群众斗争。后因叛徒出卖,他在昆

明被捕入狱,于1930年12月31日英勇就义,年仅33岁。

《狱中遗书》是王德三牺牲之前写给父亲的信函,由于须经敌人审查,故隐而不彰,“曲意解释”,希望父亲能明其心意。王德三明白,忠孝难两全,但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只能移孝为忠——一心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求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以报效祖国,为了理想信念,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他没有屈服,而是选择杀身成仁。

在信中,他先向父亲保证自己所行乃正义之事,无法明言,只能如此保证“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见《王德三遗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本文引文皆出自该书)即他是为人类谋幸福而奋斗,绝不是干歪门邪道之事,愿父亲能理解。

而这样的宏大理想,并非空穴来风,实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自己追寻的结果。王德三出身于祥云的耕读家庭,祖父是当地的私塾先生,他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生于“书香寒士的人家”,家风正派,乡风淳厚,深受熏陶,蒙正本固;外出求学,辗转大理、昆明,后至北京,一路幸遇良师益友,读经典,开眼界,长知识,找到人生的方向,投身革命。

为了让父亲知晓他的理想,但又不能明说,只能这样“婉曲”地讲。他家长里短,牵挂家人乡邻,叨念亲朋好友,思念父母兄弟姐妹妻儿,情意绵柔,读之令人动容。也表明自己的正义之行,离不开父亲、兄弟和老师的教导与影响,“详细写出幼年生活,在叙述我的生活方向发展的基点”,是家风乡风奠定了正义的根基;自己的选择实为“社会环境所规定”,是时代的先声“代表着所处时代的发展”。向父亲表明自己的心境,同时暗示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虽不能明示,但请父亲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得起良心、祖宗和祖国——绝对是正义之事,不会辱没先祖。

在家国之间,王德三选择舍小我大我,为民族的解放大业献身。因此“只



能用移孝作忠的道理来安慰父亲”,不断宽慰老父,愿其明大义,勿悲伤,保重身体!家国不能兼顾,他只有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了。

如何宽慰一位接连丧妻、丧子,又要再丧子的垂垂老者?无语哽咽,哀伤决堤。王德三试着以情劝慰父亲,点明大哥健在,喜添贵子,自己的妻儿安好,家族形势可观,慰父莫悲伤。王德三有兄长一人,胞弟一人。胞弟馨廷于1923年参加学生运动时,被反动警察殴打成疾,伤势严重,后因缺医少药,最终与世长辞,去世时年仅15岁。现在他本人也将就义,不能再在父母膝前尽孝。他只得开导父亲:相信他的英雄会回家“随着父亲、母亲,常读此书”,将“祭如在”改为“记如在”,记忆也是一种存在,不忘儿,儿就在。并以理说服父亲,“人各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是革命,就必有牺牲。他心中期盼的是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共产主义的胜利,只要有革命成功的那天,就是万死也无恨。

同时,王德三告诉父亲,自己看透生死,“儿对人生,层层看透,自信比和尚还了悟些”,已然看透,坦然向死。“人生自古谁无死?”况且,自己是干伟

大的革命事业,追求真理,“凡是真理的拥护者,是至刚至烈的人物”,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为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死已置之度外,“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直接向父亲表明,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他甘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是为革命而死,父亲不必悲哀,不必难过,精忠报国,虽死犹荣。

百般告慰老父之后,王德三交代后事,隐微地传递信息,传情、传信念、传希望,坚信革命必将胜利。他向妻子深情告白,“爱到她的每一根头发!”愧对妻儿,表达歉意吗,“儿最不放心的就是你那热爱难舍的媳妇,她为儿受尽一切人世的苦难”,彰显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侠骨柔情。在王德三行将就义之时,其妻也不幸被捕,王德三不知妻子已身怀六甲,不知妻子的处境。他曾与妻子畅谈理想,交流革命经验,互诉衷肠,鼓励妻子坚定信念。不失所望,其妻也确实如此,马冰清女士一生为理想奋斗,吃尽苦头,受尽磨难,锒铛入狱,坚贞不屈,即便丧夫丧子,依然继续革命事业,宣传先进思想。后又被诬蔑为“叛徒”,却屈不挠,教书育人,含冤20载方昭雪,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战士!

他还通过家书向革命同志真情告白,传递革命的信念和希望。表明自己决不会变节,决不反对革命,破坏革命,更不会卖友求荣,苟且偷生,请大家放心前行,继续未竟的革命大业。他那坚定的信念与坦然赴死的气节,不仅感天动地,还坚定同志们的决心,激励大家共赴革命伟业,不畏艰险,不惧生死。告白完毕,便可安然赴死矣!

读罢遗书泪盈眶,字里行间燃星火。王德三坚定的信念犹如不死的灯火,终成燎原之势,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共产主义在东方升起。他短暂的一生,奉献于革命事业,不怕困苦,不畏艰险,不惧生死,坚贞不屈,诠释出共产党员的伟大精神。如其所愿,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还强起来了!如其所言,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陈汝言与正风出版社

陶诗秀



两个人推敲了半天,最后选定了“正风”两字,意思是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徐先生随即挥笔将这5个字书写了5遍,最后他亲自挑选了最满意的那一幅用做招牌以及封面、书脊与封底的Logo标准字。在陈汝言心满意足地告辞时,徐先生又说:“找个合适的地方举办一次仪式!我虽然不是大富翁,出点钱做开办费还是可以的。不过……”徐先生突然停下,意味深长地望了陈汝言一眼,然后说:“办出版社就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我看似乎可以多出些有艺术价值的外国文学和本国的好作品。中大许多教授对你的印象很好,你去请他们组织个编委会。只要他们答应了,你来找我拿钱!”

陈汝言十分兴奋,他知道,徐悲鸿答应他的不仅是办社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他的社会声望。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徐先生在新加坡、新德里、吉隆坡和槟榔屿,在昆明、贵阳和重庆等地举办画展,把收入全部捐献给背井离乡的难民,社会各界对他的高风亮节十分敬仰。陈汝言回到沙坪坝立刻去找柳无忌和徐仲年两教授商议,编委会很快得到了几位教授的允诺。当她再去石祠看望徐悲鸿大师时,徐先生也十分赞赏这位高级知识分子都高兴,因为他们又有了一个自己的文化出版社。

正风出版社的特色在编委会成立以后很快就确定下来,那就是以“有系统地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主,他们首先发言,徐悲鸿先生以发起人身份首倡,傅抱石、陈之佛、丰子恺、洪范五等画家、学者都参加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高兴,因为他们又有了一个自己的文化出版社。

“我给你1000元,这是两匹马的价钱。可是,我们给出版社取个什么名字呢?”徐先生问。

正风出版社的特色在编委会成立以后很快就确定下来,那就是以“有系统地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主,他们首

□ 文艺新观

诗思传情 诗意图心 ——鲁若迪基组诗《侗乡游踪》读后

和克纯

鲁若迪基是一位在诗坛很活跃的诗人。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之一,他是一位勇敢的攀登者。多年来,他在诗歌领域不断求索,不断地向着诗歌高峰攀登。他的目标和追求都很高,取得的成就也高。

前些天拜读了鲁若迪基发表于2022年第2期《民族文学》的组诗《侗乡游踪》。那巧妙的构思,鲜活的场景,生动的语言,深远的意境,活脱脱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强烈地感染和触动着我。

组诗《侗乡游踪》最突出特点就是,源于自然、融于自然的神韵与精美。《新晃之晨》,诗人用“从鸟语中醒来/心情如花绽放/一天的美好”开篇,三言两语,描写了新晃从鸟语中醒来后的自然情状,抒发了诗人愉悦之情。

书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人类智慧的海洋。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诗人对书院有独钟,《龙溪书院》的结尾处写道:“唯有书院/在喧嚣的街市/收藏一份静谧/放置一张安静的书桌/唯有那些文字/在暗夜里发光”,诗人通过仔细观察,细细品味,深入思考,得出“唯有书院”,“在暗夜里发光”的真知灼见。

走到哪里,阅读到哪里。哪里有美的事物,诗思就在那里生发,灵感就在那里闪现,诗歌就在那里生根、发芽。诗人心目中的《风雨桥》别具一格。他说:“这哪里是桥?分明是一幅/美轮美奂/美不胜收的画/这哪里是桥?分明是一首/独具匠心/立志高远的诗”,这般超乎寻常的想象和描摹,给读者引人入画与诗的意境。“然而,这确实是桥/桥之上的桥/我猜想/天河上/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也是这个模样”,诗人目视寰宇,思接万里,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去,从人世间普通的桥引向天河上的“鹊桥”,进而联想起“鹊桥相会”的意境传递着最深的情。

美,大自然的底色,生命的本真,

诗歌的本相和永恒的主题。鲁若迪基的《山水边的女孩》通过对“山水边的女孩”的描画,表达了诗人“渴求安身和安心”,追求美的永恒和永恒的美之心境。

如果把这组精美的诗与10多年前出版的《鲁若迪基抒情诗选》中大部分诗作比较,不论是语言的运用,结构的安排、修辞手法的使用,还是情境的创造,其突破与上升,令人惊叹。

诗歌不只是语言的花朵,也是思想和心灵的花朵。鲁若迪基是一位很有语言天赋的诗人,他那娴熟的创作技巧与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诗歌描摹出的自然精美之境界,值得我们致敬。

○ 阅读笔记

一部迷人的书

吴安臣

周晓枫的《幻兽之吻》是我2021年读得最为认真的一本书。

这也许和我一直以来喜欢她的作品有关,这本书是我期待很久的书,其思想的深度、信息的密度,令人着迷;这是一本值得反复揣摩、沉思的书。本书内容呈现出学者的严谨之美,因为作者一直像博物学家、动物学家一般去深切体验,更会真正地体现其在场,她是当之无愧可称为散文作家中颇具匠心的大家之一。

这本书里她无论是写飞禽走兽还是家居宠物,包括人类自身,笔端总富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却又兼具惊人的理性。深入思考你会发现,她一直在探寻人性的幽微。讲述世间不可名状的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探寻那些颇富代表性的影视明星与作家的心理与她们所处的时代……这些故事里既有温暖与和谐,也有残酷与哀伤。爱与憎,离与合;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故事总是如此让人感慨万端。人在审视动物,动物也在审视人;动物与人磨合,与人的世界不断产生交集……

作者通过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散文的疆域是可以扩展的,她就像一名已臻化的武林高手,已经将十八般武艺融会贯通,化为无形。我们眼花缭乱的同时,不经意间就看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作者笔下,散文写作的形式也变得多样了。写作者在散文创作里的局限也消失了,看似信马由缰,然而作者始终在背后操纵着那些无序的文字,太极高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此书的语言特色鲜明,如滚滚雷石直击耳鼓,杂文一般的犀利。语言开掘的力度上,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语言的利器切开人性幽微的通道,也洞开了人性的黑洞。虽人常言“文无第一”,不揣浅陋,国内散文作家能与其匹敌者鲜有其人。

她写动物,完全是动物学家的笔触,你看不到一丝业余的痕迹;写捕鱼,她亲历现场,所以那种触感直接粗暴,力透纸背,字里行间似乎能闻到扑面而来的血腥味——目睹鱼在挣扎,捕猎者的整个动作镜头般清晰。

动物的生存法则折射的是人的法则,如何避免受到伤害,如何将生命延续下去,动物们悄然间似乎就具备了与人相处的智慧,比如《野猪记》,它们狡黠也好,装憨也好,猫的套路究其根本无非想从人那讨口饭吃。作者说,“猫能看透白昼,也能看透夜幕;能看透生,也能看透死。所谓暮色和虚无,只是为人类设置的障碍,对猫,构不成任何威胁,它畅行无阻。”然而猫虽有九条命,却也得在人的地界上小心翼翼活着。当然,野猪与人相处也有温馨场面,作者还给它们取了很多名字,当作家人一般相处。

“文章买卖”指的是出版事业,“复社”指明末太仓人张溥、张采集江南诸文社为一,称复社。这些都是“风流人物”,隐喻陈汝言有复社余风。下面四句含蓄隽永,对当局颇有针砭。“苏黄”指苏东坡与黄庭坚。宋元佑间,蔡京擅权,诬苏、黄为“奸党”。二人遭贬,连他们的诗文刊版也查禁了。这是讽刺当政者将许多好书都查禁了。这一年,柳亚子年近花甲,陈汝言仅36岁,诗中这样的评价够高的了。

“鱼是作者许多文章里被描述的对象,面对人类,除了金鱼用于观赏,其他许多鱼的终极命运是成为人类腹中物。在作者看来‘鱼,生前死后,都是哑者。它们保持着令人满意的宁静,这是牺牲

读书

3

□ 娘娘撷珍

陈汝言与正风出版社

陶诗秀

1938年春,重庆市郊沙坪坝镇上,有家小书铺开张了,招牌是上海杂志社公司分店。别看它门面不大,店里的顾客总是熙熙攘攘。当年的沙坪坝乃是雾都重庆的文化区,中央大学、中央工专、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南开中学、南师附中等这些学校都散落在镇外山坳里,这家小店出售的是青年读者最爱读的作品,所以很受欢迎。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店的经理,是一位刚刚从上海溯江而上来到巴蜀的29岁青年陈汝言。

陈汝言祖籍江苏太仓,1909年生。十几岁他就到上海市郊浏河镇做学徒。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唤醒了这个青年人的爱国热忱,他在满滞后有了微薄的工资,便刻苦自学,努力读书,不久后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量才补习学校学习,后又参加了救国会,在章乃器先生领导的宣传组工作,任油印小报《暮鼓》主编,后又转任到《新闻日报》。短短几年,陈汝言在文化事业上的进取心非同一般。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他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山城重庆。他听说李公朴先生住在民生路冉家巷读书生活出版社里,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到了校长兼负责人云南人黄洛峰。两位长者建议他到沙坪坝去开设售书点,所有书刊由生活·新知与读书生活出版社供应。陈汝言欣然从命,他又从李先生那里知道了上海杂志社创办人张静庐的住处,第二天他就去拜见,谈起想去沙坪坝办书店而没有招牌的事,张先生也很乐意扶植这个年轻人,当面允许他使用上海杂志社分店的名义开店。

陈汝言就这样白手起家在沙坪坝开起了书店,4年里,书店生意十分兴隆。卖书过程中,他看到顾客中年龄较长者、书卷气较多者,就主动向他们推销。在不太长的日子里,他结识了胡小石、傅抱石、范存忠、吴天石、陈之佛、柳无忌、吴景荣等一批文化界名流大师。在这些大师面前,陈汝言执弟子礼,没多久,他进了中央大学文学院当旁听生,一读就是3年,想不到这个学习经历后来成了他出版发行几百种外国文学名著的知识基础。

1943年前后,文坛老将中有几位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如沈钧儒的“峨